

楊立三年譜

楊立三年譜編輯組編

一九〇〇—一九五四

金盾出版社

杨立三年谱

金盾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太平路5号（地铁万寿路站往南）

邮政编码：100036 电话：68214039 66882412

传真：68276683 电挂：0234

北京市金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50千字

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55082·152
(内部发行)

杨立三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和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榜样，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榜样。

——周恩来

出版说明

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同意，军事科学院审阅，《杨立三年谱》在杨立三同志逝世5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发行。

杨立三同志（1900～1954）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后勤工作的奠基者和主要领导人。1925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经历了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大革命时期，曾任乡、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长沙县区支部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方面军副官长兼经理处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部长、后方办事处主任、总

兵站部部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八路军兵站部部长，中央军委后勤部副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八路军前方总部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兼任冀南银行董事长，冀太联办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经济部长，晋冀鲁豫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军区后勤外线司令员、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财经委员会委员。

杨立三同志从事的事业，涉及军事、政治、后勤、财务、兵工和财政、税务、金融、贸易、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以及国计民生等诸多领域。杨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榜样，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榜样”。学习楷模，了解历史，继承革命传统，发扬

优良作风，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更好地投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是本书编辑的目的。

本书取材的主要来源，是杨立三同志的40多部工作笔记。在此基础上，参阅了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总后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后勤指挥学院图书馆等单位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和图片，以及总后勤部、后勤指挥学院编辑的各类历史丛书。杨立三夫人李琴同志和长期在杨立三同志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唐成仪、徐镇江、孙学著、李舟、王波等以及金盾出版社的张延扬、郭德征、王金相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李琴同志还提供了一些长期珍藏的宝贵资料。谨向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采用编年体形式，按年月日顺序纪事，具体日期难以考订的，通常放在旬末、月末、年末，少数条目采用了本末纪事体的方法。叙述谱主活动，尽量省略主语。客观陈述历史事实，一般不作评论。文中涉及的人和事，必要时作了简要注释。同时，附有随文插图和图片插页。

本书由总后勤部原参谋长、财务部部长蒋胜

祥主笔，编辑组成员有：戴景山、吴昶、贾延祁、黎品纯、齐景祥。因编者水平有限，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立三同志谢世已 50 周年。谨以此书献给老首长杨立三同志。

《杨立三年谱》编辑组

2004 年 7 月 1 日

代 序

后勤雄才 风范昭人

——纪念杨立三同志诞辰 95 周年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杨尚昆 宋任穷 戎子和 周文龙

杨立三同志是和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41 年前，1954 年，他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他逝世后，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的一生“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榜样，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榜样”。

(一)

杨立三同志从 1927 年参军起，就胸中装着革命全局，无私无畏，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

刻。我们学习立三同志首先要学习他的全局观念。

立三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区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通过半工半读，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文化知识。为了寻找光明，他19岁投入了湘军，以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叛乱战争。大革命兴起，立三同志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农民运动，组织乡农民协会，宣讲革命，支援北伐军北上。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深受教益，加上阅读大量进步报刊和书籍，使他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从此，他走向崭新的人生道路。1927年9月他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立三同志参与了包括废除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和经济民主制度、打土豪筹款、建立根据地财政工作、开展后勤建设等内容的新型人民军队后勤的创建工作。

1930年8月，立三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副官长，翌年又兼总经理处长。他主持制定并正式颁发了红军第一部供应标准制度，为红军供应正规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1932年红军进军漳州，立

三同志先后任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兵站部部长、政委，领导后方的军事机关，创办军工生产、被服厂与医院等，形成部队后方供应基地，并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在长征路上，身为兵站部长的立三同志为部队的食品供应朝夕奔忙。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总是为后续部队留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过草地时，周恩来同志刚刚大病脱险，还发高烧，身体虚弱，走不了路。彭德怀同志决定组织担架抬过草地。这个任务，责任重大而又艰巨。立三同志深知，保证周恩来同志的绝对安全是革命全局的需要。于是他毅然参加了担架队。草地高原缺氧，随处都有致人于死地的陷坑，不知吞噬了多少战士。整整6天6夜，杨立三寸步不离周恩来，硬是安全地把他抬出了这片“死亡之地”。走出草地，立三同志自己便病倒了。宋任穷同志得知立三同志病倒的消息后，立刻派人用担架抬着立三同志继续前进。1935年12月，党中央决定进行东征抗日。东征的关键之一是克服黄河天险，保持东征部队与陕甘根据地的联系。为此，毛泽东同志多

次给周恩来、杨立三同志等发信、发电，要求立三同志在两天内修好 24 只破船，筹集若干皮筏，准备 500 副担架，以供渡河。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河面，时间非常紧迫。立三同志亲自去延水、延川、清涧、延长 4 县，如期完成了担架动员和渡河器材的准备，保证部队安全渡河东征，并及时地把兵站线伸向山西境内。在 1936 年 5 月红军回撤前，他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亲自勘察河道，侦察敌情，在东岸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从无定河口放船下驶 200 余里，准确无误地到达清水关，接渡毛泽东、彭德怀及所率的东征红军安全西渡黄河，顺利撤回陕甘边区。为此，杨立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嘉奖。

立三同志胸有全局，一生忠诚于后勤工作和财经工作，从不计较名利。1939 年 2 月，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致电延安毛泽东等，要求派杨立三来前方主持后勤工作。4 月，杨立三奉命来到晋东南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长。后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兼任晋冀鲁豫根据地边区政府（1941 年 7 月以前称冀太联办）财政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 1939 年成立的冀南银行

董事长。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他肩负着根据地军队、政府的财政工作重担。立三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领导下，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配合的原则，为壮大根据地财政经济，保证军需民食，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从1942年起，财政赤字逐年缩减，到1944年最终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

杨立三同志在他革命的一生中，想问题、办事情，历来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整体观念的高尚风格。我们学习立三同志的整体观念，就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把各项事情办得更好。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极端困难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受到日寇更加疯狂的“封锁”、“蚕食”和“清剿”；又连年遭受水、旱、蝗、雹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奇缺，财政困难。正

当此时，即1941年9月6日，党中央来电告急，指出陕甘宁地区中央机关、学校约2万人，每年需开支1500万元，除已分配华中解决900万元外，要求由华北解决600万元。杨立三同志深谙中央之困难。他秉承彭副总司令的整体观念，宁愿自身勒紧裤腰带，也要为党中央分忧解难。

立三同志在考虑整体利益的同时，也重视局部利益，力求做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历史上著名的“滕杨方案”便是最好的体现。1943年9月，立三同志组织后勤部机关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创造了一些经验，得到彭德怀、邓小平同志的支持。1944年4月，总部颁发了由参谋长滕代远和杨立三提出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这个方案在总结敌后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个人积累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等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对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活动实施奖励和分红，极大地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节约运动持续健康地发展。这个方案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公私兼顾”的思想，不仅对开展太行山部队和其他地区部队的生产运

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为加强军民团结共渡困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展开了持久的斗争。而当时我对敌经济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斗争。对此，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立三同志体会颇深。他在工作中，总是从长远观念提出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深谋远虑，作出决策。因而，在对敌经济斗争中，他始终掌握主动，创出奇迹。

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1939年春，立三同志刚一来晋东南，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汇报，主持生产、财经会议，掌握了基本情况，并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上果断地提出屯粮、屯棉、屯盐的建议，要求部队开荒屯粮30万担，总部屯粮40万担，屯棉25万公斤，屯盐50万公斤。他还要求冀南银行印冀钞500万元，一半给军队主要用于购粮，一半作为发展生产贷款用。这一着棋确实收到明显效果。太行山西部的上党

盆地是著名的产粮区，而东部地区人多地少，历来就是“东人吃西米”，因此粮价东高西低。1942年底，获得敌人要在产粮区低价抢购粮食的情报，立三同志先发制人，经领导批准，组织力量，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向西线购买粮食21万担，并组织民力运往冀南、冀中。这一斗争，不仅使敌人的抢购计划落了空，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冀南钞的流通范围。

发行冀南票，是党中央的决策。立三同志被委任兼冀南银行董事长，担起发行冀南票的任务。当时，晋冀鲁豫区伪币充斥市场，给敌人用伪钞从根据地收购粮棉，大量走私以可乘之机，如不急加整顿货币，将严重影响根据地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建设。立三同志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抓紧工作，就在1939年10月正式发行冀南票，作为冀南、太行区的本位币，并废除全部土票。有了本位币，敌人无法套取外汇，根据地内可以停止法币在市场流通，加之严格控制发行量不超过根据地人均3元的数目（以后增到人均10元），金融趋于稳定，市场得到控制，打击了敌人，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是进行长期战争

的需要。立三同志深刻领会中央的方针，高度自觉地贯彻落实。1940年9月，第一二九师后勤机构合并到八路军总部后勤机构，立三同志坚决支持，于1941年1月实施。立三同志遵循北方局和彭总的意图，精兵简政非常坚决、彻底。他陆续将供给部粮秣处移交给边区粮秣厅，又把供给部的政治部合并到后勤部政治部，还对各部门的机构进行调整和精减。如卫生部原设处科两级机构，机关最多时有210人，经过精减，撤销了科处两级机构，只编制11人。

立三同志坚定的长远观念和忠心耿耿、脚踏实地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对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好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人的有力鞭策。

(四)

立三同志的群众观念，更为人称道，有口皆碑。他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体谅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绝不与民争利；在工作中相信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这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颂。周恩来同志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1943年，由于物价上涨速度快，军工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立三同志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以几种生活必需品作为工资的计算基础。这种改革，对稳定工人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晋冀鲁豫根据地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抗灾救民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当时杨立三同志经过周密考虑后建议：灾区政府减免或少收粮款；成立救济委员会，严禁粮食出口和以粮造酒；停止支差，以工代赈，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兴修水利，搞运输、纺纱；动员军民打蝗抗灾，开荒补种晚秋作物；总部机关每人每天节约小米2两，并自给全年菜金及办公杂费，动员干部战士吃野菜、稀饭。此外还规定部队不准在驻地附近采集野菜和开荒，把方便留给群众，绝不与民争利。这些措施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军民的支持，不仅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而且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